

# 郑永年：国际秩序的“再封建化” 与中国的应对之策(下)

都在构建自己的“领地”，国际秩序出现区域集团化和价值集团化两种情形。

第一种情形是区域集团化 (regional bloc)，表现为几种情形。首先，国际秩序逐渐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区域经济集团。但这是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区域集团化，要与过去全球化状态下的、和全球化相向而行的“区域化” (regionalization) 区别开来。过去出现的包括中国-东盟、北美自贸区、欧盟等在内的区域自由贸易区和全球化发展是相向而行的，而今天的区域集团化表现为我们经常所说的“团团伙伙”，和全球化背道而驰。

其次是集体安全机制的失效。目前联合国已经失去信用，乌克兰战争表明了二战以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解体。当联合国不能以任何有效的方式约束成员国遵守规则时，表明联合国的系统已经失效。联合国不是国家，只是一套规则，当规则对成员国没有约束力时，这些规则就基本上处于解体状态。

再次，人们对现代性失去了共同的认同感，土耳其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。近代以来的土耳其一直追求世俗化，

但当代的土耳其却在追求“再宗教化”和“去世俗化”。“去世俗化”这样的区域化趋势更容易造成亨廷顿所说的“文明的冲突” (Clash of Civilizations)。

第二种情形是所谓的价值集团化，也就是美国一直在鼓吹和追求的所谓“基于价值之上的集团” (value-based bloc)。对俄罗斯而言，乌克兰和俄罗斯一样同属一个民族，理应具有共同的价值观。印度、印尼等国也追求他国对其价值的高度认同。

这就是国际秩序“新封建”现象。“新封建”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两个超级大国就能主导的。纵然中美关系很重要，但也无法阻挡国际秩序走向“封建化”——各个大国都在追求和建立对己有利的势力范围，未来可能会出现很多各自为政的区域性秩序。同时，尽管区域性秩序之间也会有交往，但这种交往不会像以前一体化那样能够充分地促进资本、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。

## 新秩序下的中国对策

中国不是美国，不做、不学美国去当世界警察，称霸世界。中国也不是苏联，自然也不做、不

学苏联的封闭与集团化。冷战期间，美苏曾各自占据一个集团。现在的美国在延续过去的方式，俄罗斯也在创建自己的集团。中国既不是美国的模式，也不是苏联或者俄罗斯的模式，而是有自己的模式——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区域大国，然后从区域大国 (regional power) 走向全球大国 (global power)。中国模式中，开放和包容是关键。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搞集团化，搞排他性的多边主义，而是致力于建立包容开放的多边主义和区域多边主义，以此继续推进全球化，最终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。

第一，从短期看，我们要更理性和科学地应对新冠疫情，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本领。中国要逐步开放，否则会面临与西方的脱钩。既然西方各国都开放了，我们不开放就会是自动脱钩；而一旦脱钩则会促成美国世界秩序两极化的目标。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，我们都要防止与西方脱钩。再者，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，我们要用最小的经济成本来对付新冠。现在我们应付新冠的经济成本还是过高。而且，我们要为社会减少压力。目前社会积攒了很多抱怨，这在加

重社会压力。但是，开放也不能激进地开放，而是要逐渐、科学渐进式地开放。毕竟新冠病毒危害到人的生命，要尽量减少牺牲，要根据新冠病毒变异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应对。如果是激进的开放，也会造成社会反弹，导致一些无组织的社会暴力。比如2003年SARS期间，大家自发地组织起来，封村、封巷、封楼。一种逐步的、有组织的、有序的开放更符合我们的国情。

第二，要理性处理中美关系。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，但美国的衰落并不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和挑战。美国的衰落是其内部的问题，中美关系恶化也是美国内政的反映。我们要允许美国有足够的时间去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，尽量减少跟美国的直接冲突。

第三，要独立处理跟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。如前文所述的印度、土耳其等国的关系。我们在处理跟其他大国关系时受中美关系 (美国因素) 的影响过多，我们应当有独立的政策处理与这些大国所处的“势力范围”。

第四，继续搞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通过“一带一路”、金砖国家和亚投行等多种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(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)。但在新时代，我们要改变外交方式，要从过去融入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，转变为要跟不同大国和集团打交道。国际秩序的封建化使得国际局势更加复杂，我们需要改变外交哲学，提升外交技能。

来源：凤凰网 大湾区评论



(图源：网络)